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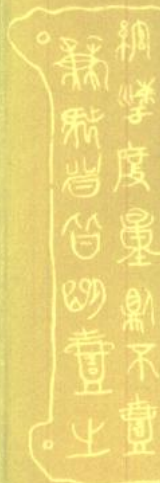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會計史稿

上冊

湖北財經學院

郭道揚 編著

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





中国会计史稿

上册

湖北财经学院 郭道扬 编著



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

中国会计史稿

上册

湖北财经学院 郭道扬 编著

*

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武汉市江汉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4.875印张 320,000字

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000

统一书号：4166·358 定价：平装1.90元
精装2.60元

前 言

随着电子技术在生产上的广泛运用和发展，现代会计将面临着—场深刻革命。在立足现实，研究未来会计发展势态的同时，系统探讨一下会计发展的历史是很有必要的。越是在人类社会生产革命的跃进时期，对于它过去发展经历的回顾，乃至对于历史遗产的研究就越是显得必要。鲁迅说过：“我们看历史，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。”^①过去的会计在历史演进中所反映出来的种种规律性，以及它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特点，也正是我们研究现代会计和预测未来会计发展情形的重要依据。任何—门科学的研究，都不能割断现实与历史的科学联系，而应当尊重历史，应当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去分析历史，认识历史，吸取历史中的精华，继承历史留传下来的珍贵遗产，努力为现实服务。此乃无产阶级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，也正是我们研究中国会计发展史的基本出发点。

“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，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。”“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。”^②在我国优秀而丰富的历史遗

^① 鲁迅：《华盖集·答KS君》。

^② 《毛泽东选集》—卷本，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，第586页。

产中，会计是一个重要方面。我国会计不仅有自己的发展道路，而且以显明的独创性影响于世界。这个册子具有“长编”性质，仅为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一些史料，并作一些浅薄的解释，以供广大经济学者、会计工作者研究参考。中国会计史是中国人民的创造之一，只有中国人民贴切地接近它、了解它。我们深信只要广大经济学者、财会工作者认真探讨，严谨勾考，一定能编纂成史，以古为今用。

二

毛泽东同志讲：“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，虽然是一个地广人众、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；可是，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，其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的发展，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。”^①我国会计的发展过程正是如此。中式会计虽渊源甚古，但自战国以来，在延续二千三百余年的封建社会中，它伴随着封建王朝的一盛一衰，封建经济的倏起倏落，在波浪起伏的历史进程中，步履维艰，进展滞缓。在元明之前，它矗立于世界先进之列，闪耀着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灿烂光辉。然而在这个时代之后，它便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，随波逐流，缓慢前行。从而，由先进退居落后，由渐进沦于因循守旧，由自力独创到不得不引进外来的记帐方法。纵观中国经济之发展道路，深入考究中国之国情，上述情况又是十分自然的事了。这正如恩格斯所讲：“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，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、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，归根到底都是应由

^① 《毛泽东选集》一卷本，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，第586页。

这个基础来说明的。”^①在封建社会中，我国会计之所以处于进展滞缓的状态，这是由于封建经济长期处于发展滞缓状态所决定的。而社会经济发展的滞缓状态，归根到底又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原因所决定的。封建经济是小农制经济，“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。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，也排斥协作，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，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，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。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。”^②在中国，“小土地所有制”或“小生产方式”，其本身所固有的弱点，不仅妨碍着生产力的发展，而且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，造成千百万农民的极端贫困和落后，又一直使社会经济不得不停滞在其极其薄弱贫乏的基础上。同时，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，在这种经济结构中，占支配地位的是使用价值，而不是交换价值。生产的目的是为着自给自足，而不是为了积累价值。这种情形不仅使得农业经济禁锢在一个极其狭小的圈子内，而且使得所谓的工业长期处于低下的、分散的、缓慢延伸的手工业状态之中。这种状态下的手工业，生产交换价值不是本身的目的，而保证其生存和取得使用价值，才是进行生产的直接的、主要的目的。自然，生产的这种状况，又严格地束缚着交换的范围，这样的生产，使得这个时代的交换，处于一种凭靠买贱鬻贵，投机取巧赚取高额利润的贩运性质的商业状态之中。这种商业不是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，而是生产过程之外，单独地存在和发展着的。反过来讲，生产也无力支配流通，也并不把它当作自己的要素。“在这种情况下，流通

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三卷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，第66页。

② 马克思：《资本论》第一卷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，第880页。

过程与生产过程是各自独立的，商业资本与它所媒介的各个生产部门是互相分离的。”^①总之，封建经济把农业、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都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，使其在自给自足之中，在维护封建秩序之下求得生存。封建经济规律所要求的，是安定而不是发展，是守旧而不是进步，是稳固而不是变革。显然，封建经济规律的这种要求，封建经济的上述状况，对中式会计的发展，不能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桎梏。

在中国，封建地主经济的统治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时期。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，社会经济结构始终没有发生任何质的变化，前一王朝在经济崩溃之中衰亡，后一王朝则随着经济恢复而建立起来。然而，前者之覆灭，后者之兴起，只不过是同一现象的反复，同一经济结构的再生。总而言之，朝代的兴亡，政权的更迭，终不过新瓶旧酒的把戏。不过，应当讲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，依然是不停地发展着的，只是这种发展由于人祸天灾所致，表现为时上时下，一盛一衰，一治一乱，反反复复，曲曲折折，发展之缓慢，进步之微弱，历经数千年之久，尚不能发生动摇封建制度的本质变化。中国封建经济这种迂回、曲折、缓慢进展的状况，自然对这个时期的会计发展，起着牵制作用，使得中式会计的发展也必然处于迂回、曲折、缓慢进展的状况之中，而不可能逾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，产生任何爆破性质的变化。

在我国封建社会中，封建统治者很早就造就了他们施行统治的理论依据——“王制”。“王制”成为历代统治者的传家之宝，是维护封建秩序的道德规范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治世标准。

① 傅筑夫：《中国经济史论丛》上册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，第375页。

“王制”混合了社会的经济、政治、法律、宗教及伦理等等，几乎囊括了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威慑力量，把这个社会中的各行各业，一切臣民统统束缚于封建链条之上，顺“王制”者昌，逆“王制”者亡，反“王制”者则株连五族。其专制统治，令人发指。从维护封建“王制”出发，这个时期主要朝代的统治者所推行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为“抑商政策”。这项政策的目的是，在于阻止工商业的发展，维护封建制度的统治基础。因为封建统治者明了，商业（包括手工业）是引起社会变化的起点，是直接间接造成社会动乱的根源^①，是危及封建秩序和道德规范的祸种。所以，封建统治者所采取的“抑商政策”不仅是个经济问题，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。由于商业与财利相关，有它吸引人的地方，故统治者推行“抑商政策”，首先是从舆论上把“商业”搞臭。他们把商人斥为“市井小人”之流，“屠沽负贩”之辈，《左传》讲：“……小人近市，朝夕得所求，小人之利也。”^②后世小人谋利之说，大体源于此。《左传》还讲：“其士竞于教，其庶人力于农穡，商工皂隶，不知迁业。”^③这里把商工与皂隶并列，划归庶人之下，视为末流。《史记》中也讲：“行贾，丈夫贱行也”^④，亦可见其地位之卑贱，行业之渺小。另外，还从政治、法律上歧视商人，如规定商人不得穿锦衣，不能乘车马，子孙不得为官吏，甚至命“佞卖者……一足着白履，一足着黑履”^⑤，从人格上加以侮辱等等。其实，道德上的蔑视，人格上的侮辱，尚能加以忍受，商人所惧怕者，则是经济上的

① 《中国经济史论丛》上册，第21页。

② 《左传·昭公三年》。

③ 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。

④ 司马迁：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。

⑤ 《太平御览》卷八百二十八。

专制和挤压，而封建统治者推行“抑商政策”，其主要手段恰在于此。诸如土贡制度，币制更改，禁盐铁，榷酒酤，工商官办，乃至抄没家产等等，可谓之层层设禁，处处管制，连挤带压，惩处抄没兼用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这种种手段，确实抑制并打击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，使工商业的发展一直处于被动地位，尤其是商业不仅其自由发展受到束缚，而且长期停留在贩运性质的个体经营阶段，从而造成工商脱节，商业的发展与一般经济的发展相背离。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，工商业的这种性质，这种状况，正是我国民间会计发展滞缓的根本原因。而民间会计发展的滞缓、落后又是造成我国整个会计发展滞缓落后的主要原因。世界会计发展的历史表明，民间会计的发展，在整个会计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，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世界上最早的簿记法产生于民间而非官厅，世界上最先进的记帐方法亦产生于民间而非官厅。故一般讲，民间会计的发展要先进于官厅会计。然而，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中，会计的发展情形则恰恰相反。自夏、商及西周以来历代的官厅会计处于支配地位，而民间会计则大体亦步亦趋，尾随其后，其差别甚微。从总的方面看，至元明之际，我国民间会计大体落后于官厅会计。严格讲，直到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之后，我国工业才逐步从手工业状况中解脱出来，商业也逐渐从单纯贩运性质的经营状况中摆脱出来，工商业之间的关系随之有所改善，此二者渐自成为动摇封建制度根基的因素。这时，我国会计，尤其是民间会计发展才有了较大起色，其中，突出的是，在中式会计中产生并有了复式记帐法的运用。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起色，自然造就了我国会计发展的新前景。

在封建社会中，工商业发展的缓慢、落后状况，不仅导致我

国会计，尤其是民间会计处于缓慢延伸的状况之中，而且工商业在社会中的卑贱地位，也使得一些学士、大夫，以及其他阶层，对计数和会计加以轻蔑和歧视。他们所谓提倡道德、排斥功利的信条，成为我国主要朝代的封建统治者重士农、轻工商的理论依据。那些自诩为正人君子的学士、大夫，竟把商人的买贱鬻贵，巧伪百出，博取盈利与计数、会计相提并论；把商业经营与从事会计，归于一流，斥为末等。早在战国时代，就有一些士大夫之辈，以从事“会计”为可耻。《吕氏春秋》讲：“今有人于此，修身会计则可耻，临财物资尽则为己，若此而富者，非盗则无所取。”^①这是讲，那些以修身会计为可耻的人，其贪财逐利之心却如狼似虎一般，正恨不得把天下财物一口吞下去，这样富起来的人同盗贼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其时还有人批驳此说，可是到了后来，鄙视计数与会计的论调便成为一言堂了。“古人志道据德而游于艺。然九数虽为最末事，若而今行经界，则算法亦是 useful。”^②朱熹从搜刮赋税出发，虽然承认计数有用，但他却公然把计数列为末等之事。往后，耻言功利之说，鄙视计数之论更盛，连一些数学家也深有体会。如清初数学家陈世明就讲：“尝观古者教人之法必原本于六艺，窃疑数之为道小矣，恶可与礼乐侔。”又讲：“后世数则委之商贾贩鬻辈，学士大夫耻言之。皆以为不足学。故传者益鲜。”^③陈世明虽不以此为然，但已深深地感受到沉重的社会舆论压力。可想而知，在我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，这样的社会风气，这么大的舆论压力，谁还敢将会

① 《吕氏春秋·务本》卷十三。

② 转引严敦杰：《中国数学教育简史》，《数学通报》1965年，第八期。

③ 陈世明：《数学举要》。

计之事、之法笔之于书，干自找苦吃的事呢？谁还会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以传授会计之法为业，去做招人耻笑，受人指责的事呢？！故考我国正史、稗史，浩瀚文海，几无会计专著问世，即使被帝王所重视，为学士、大夫另眼相看的官厅“上计”，也徒有几笔虚文记录，而无具体内容相传。就是类似皇朝“会计录”这样的经济文献，事后也无人问津，而大都失传于世。可见，封建伦理的束缚，也是我国会计发展的障碍之一。

以上原因，为系统考证我国会计发展史造成了一定困难：

其一，中式会计之法，既无专书问世，又无专师授业，一般师徒相传，仅凭口授心会，而千师万法，因人而异，因地而异，难求一致。官厅会计如此，民间会计亦然。这是系统考证中式会计方法发展情况的难点。

其二，在中国古代史上，政治、法律、经济、文学、艺术诸科皆有家可言，百家争鸣，史有详载。而会计一科，既无学说之立，亦无家可言，更无理可争。学士、大夫谈及财政长篇累牍，无休无止，触及会计则片言只字，一带而过。况且所云、所论，言之有物者少，言之无物者多；言之成理者少，言之泛泛者多。此乃系统考证中式会计理论方面的难点。

其三，在中国会计发展史上，受歧视、受埋没者为民间会计，而“官厅会计”在皇朝财政经济机构中，尚有一席之地。一般讲“官厅会计”是反映、监督国家财政收支实现的重要工具，是统治阶级的经济耳目，故历代帝王还比较重视它。设置机构，委派官员，颁定制度，甚至亲阅黄册，御笔加批，赐其美名为“上计”等等。从这一点出发，那些学士、大夫对“官厅会计”亦刮目相看，揽天下图书计籍，奠一代帝王根基，摇唇鼓舌，赞颂

帝王“受计”之业绩，舞文弄墨，献“会计录”于帝辇之下。间或名臣官员，也以理财为题，以会计记录为据，以出谋献策为由，呈递奏章，大发议论等等。故对于“官厅会计”演进情形尚有史可考，而民间会计发展之情形，却缺乏史料可稽，尤其是民间会计与“官厅会计”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，相互促进的情形更不得而知。这是系统考证我国民间会计发展情形的难点。即使有关“官厅会计”方面的史实，史书中也无集中专门的记载，而是零星分散于浩瀚无垠的史册之中。其中，有可以直接加以引证的；有需要加以分析选择的；有史家争论不休，需要从各个方面加以罗列的；有真伪混淆，需要加以鉴别的；还有代与代之间，不相衔接的空白点，需要从侧面加以分析推论的等等。总之，情况复杂，阐发不易，稍有不慎，便易曲解史实，造成差错。这是考证“官厅会计”方面的难点。

然而，任何历史事实都不是孤立存在的。会计史大而言之，它是中国史学的一部分，小而言之，它是中国经济史学的一部分。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，它与社会政治的、法律的、文学艺术的，尤其是财政经济发展的历史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在历朝、历代统治者的主张中，在法律条款的各种规定中，在诗词、小说、神话故事、杂记佚闻的描绘记述之中，以及在它与数学、统计等学科的连带关系中，都可以发现它存在和发展的痕迹。所以，尽管难关塞路，阐发不易，但是，它并非杳不可考，无文可记。笔者认为，只要深入发掘史料，认真加以考证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去分析认识它的发展，抓住它的规律性，上述疑难之点是基本上可以得到解决的。不过，由于笔者年轻少学，水平极其有限，对于我国古代文化典籍，在写作本书之前，几未接触，加之

分析及认识问题的能力较差，在本文中免不了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，也难免遗漏不少的问题无法加以解决，甚至还会有不少错误出现。好在陋文既出，将会得到广大学者的指教，得到广大经济工作者的帮助，还会得到其他各条战线同志们的批评。这些都是笔者所期望和十分欢迎的。为了达到与广大学者、经济工作者，以及其他战线的同志，共同研究商讨之目的，现将本文编写中，对几个问题的处理办法，呈献于广大读者面前，以候指教：

第一，关于对待历史传说的态度问题。上古之事，年岁荒远，无文字记载，难以考其究竟。对此，史家处理办法大体有二，一是以考古发现为准，二是以历史传说作必要的补充。然而，考古发见毕竟有限。事实上，在史家述及之中，传说尚占有一定地位。本文阐述“原始计量与记录时代”的这段历史，大体如此。不过，笔者对待传说，坚持科学分析的态度，既不轻信传说，把它当作真人真事加以烦琐考证，亦不轻率对待，持否定态度。而是尽可能地扬弃古人加于传说中的神话迷信色彩，结合考古发现，有分析，有区别地引用这方面的材料。

第二，关于“官厅会计”与“民间会计”的论述问题。如上所述，由于“官厅会计”与国家财政收支有着密切的关系，故尚为历代君王所重视。在我国封建社会中，一则由于工商经济受压而不能顺利地发展，二则由于民间会计史料自生自灭，日久易于失传。故“官厅会计”在会计发展史上，尚占有主导地位，而民间会计的史影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则比较模糊，只是到了近代才显露出比较清晰的轮廓。所以，本文尊重历史事实，其阐述方法，上册大体以“官厅会计”为主，下册则大体以“民间会计”为主。同时，在中古部分，尽可能地发掘民间会计方面的史

料，由远及近，由浊至清，比较客观地反映我国民间会计发生、发展的情形。使“官厅”与“民间”这两条线，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眉目。

第三，关于“官厅会计”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在阐述中的处理问题。众所周知，所谓国家财政，就是国家对资财的收入与支出的管理活动，它是以管理国家资财收支为主要目的的。这样，作为奴隶制、封建制时代的“官厅会计”，与国家财政之间就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。“官厅会计”是反映和监督国家财政收支的工具，其“官厅会计”组织，是国家财政组织中的一个重要部门，“官厅会计”核算是实现国家财政管理的基本手段。而所谓“官厅会计”制度，则是融贯于国家财政制度中的，作为国家财政制度出现的基本管理制度。反过来讲，奴隶制、封建制国家的财政组织，不能没有会计这个部门。在财政管理的许多方法中，会计核算方法又是其中的重要部分。同时，国家所颁布的重要财政制度，一般都是“官厅会计”进行核算的主要依据。所以，我们认为，论述“官厅会计”的发展史，就必然要讲到与“官厅会计”发展相关的财政组织与制度，就必须紧紧围绕着“官厅会计”的发生与发展，去阐述财计组织与制度的发生与发展。如果脱离国家财政孤立地去讲“官厅会计”，如果撇开与国家财政制度融合在一起的会计制度，那么这种“官厅会计”便成为有其肉而无其骨，面目皆非的东西。这是本书涉及到财政史方面若干问题的主要原因。

阐述奴隶制、封建制国家的财计理论也是这样。所谓“财计制度”与“财计理论”，简言之，也就是相关联的财政与会计制度、理论的合称。在我国奴隶制、封建制时代，会计专业化的程

度还十分低，所谓的“会计理论”大都是融合于财政理论之中的。如历朝历代关于“节用”的理论，一方面表现为一种财政思想，另一方面实际上又是作为“官厅会计”制度的一项原则。再如“量入为出”与“量出为入”的理论，一方面表现为一种财政原则，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会计预算的一种思想。可以说，历史上没有不重视会计的理财家，也没有撇开会计去阐发财政收支管理方面的财政理论。

严格讲，会计的专业化，会计与统计，以及其他学科的分工，是近代才发生的。事实上我国古代的会计，是一个庞杂的集合体，近代称之为“大会计”。在那漫长的岁月中，这种“大会计”几乎囊括了全部的统计内容，它还包容了业务核算的许多方面。在奴隶制时代，以及我国封建社会前期，它甚至越过经济核算的范围，深入到政治功过的核算方面。它既负责掌管山川、林泽、田地的记录，也主管户籍、人口及私人资财的登统。它系统考核国家财政的全部收支，也核算民间土地山塘的贫瘠肥沃，及其所有权的转移。这些是本书阐述中较多涉及到统计，以及其他学科内容的主要原因。

当然，阐述“官厅会计”与财政等之间的联系不能没有一个界限，这个界限应当限制在服务于考察“官厅会计”的发生、发展方面。本文在修定过程中虽然注意到处理这方面的问题，但由于水平限制，未免失之过宽，这一点亦有待读者批评指教。随着会计学科的专业化，随着近代我国民间会计的发展，会计史作为一门专史的面目将愈来愈清晰。关于这种趋向，将在本书下册述及。

第四，关于《周礼》一书史料的处理问题。《周礼》一书涉及到会计方面的论述十分丰富，资料也十分珍贵，即使对于现代

的管理与核算也极有参考价值。另外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，这就是“周礼财计制度”几乎对历朝历代都发生过深刻影响，封建统治者承袭相传，学舌模仿，皆以先王之制推崇之。从世界范围讲，在二千多年以前，就有这样完善的财计著作，也是极其少见的。故编写中国会计史不能漠视这个事实，不能敷衍对待这些史料，而应当给它安排适当的位置，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。

关于《周礼》成书的年代，至今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，不过史家大体有一个基本倾向，一般认为虽然“书为晚出”（多数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），但绝非“向壁虚构”。其所记内容“基本上能反映西周的政治经济情况，或西周封建政权的若干规划。”^①加之，“书中之制与今合者十之八九”^②，对会计、审计之制及会计方法的论述又十分具体，因而，“说古代的个别作者能凭空臆造出这样一部著作是不能想象的事情。”^③笔者基本上赞同这些看法，书中对《周礼》中有关会计方面论述的处理，也基本上是持这种立场。

基于上述观点，本书将《周礼》一书仍放在西周一节去讲，而对资料的具体取舍，则注意到把握分寸。凡书中与西周政治经济情况切近，或有其他史料旁证者，大体上作为当时的史实对待；凡与当时情况不相符合，又无其他旁证者，则视同其理想成分引述；对某些部分则作为当时的财计思想对待。尽管如此，本书关于《周礼》一书的引述，仍难免有不妥之处，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。

第五，关于对民间会计的阐述，以私营商业为主的问题。上

①③ 胡寄窗：《中国经济思想史》上册第二章，第51页注解31。

② 张心激：《周礼财计制度》。

述已讲到，地主制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形态。在土地占有方面，皇帝为最大的地主，但无论是公田（或称官田），还是为皇帝所有的私田，其会计一般归于官厅核算之列。那些被皇亲、国戚、太监、达官，以及乡宦豪绅占有的土地，靠出租榨取收入，其会计虽属民间部分，但此类收支核算十分简陋，粗鄙不堪，影响极小，故不被人重视。谈及佃农及自耕农，由于土地狭窄，生产力虚弱不堪，况且，遭受到层层剥削，常处风雨飘摇之下，饥寒交迫之中，较好者尚能吃糠咽菜，苦渡时日；悲惨者“卖田宅，鬻子孙”，落得倾家荡产。可以想见，那有余钱剩米上帐，有甚家私财产可录？！所谓会计，与其关系者，只不过是那些催命的符咒——借契、卖契、典当之契而已。所以，在封建社会的部门会计中，以“农业”为最落后。然私人商业则不同，在封建社会中，虽然商业只能在禁网疏阔的隙缝中，及卑贱屈辱的地位下，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。但是，只要那些商人的经营活动，不与封建礼教，封建制度相背离，他们便可以凭借个人的能力和手段，呼风唤雨，牟取千金之利。况且，那些家资巨万的富商大贾，不仅为良田万顷的拥有者，而且无一不是搜刮暴利的高利贷者。在都城之中，他们铺面连市，天南海北各设分支。城有质库，郊有工场，乡有田产。家财万贯可尽南山之树，锦衣玉食、娇妻美妾敢与王者埒富。经营有伊尹吕尚之谋，逐利如猛兽鸷鸟之发。转手之间便有千金之得，每一交易，动即千万，常使市人惊倒。历朝历代有其人，史书齐称“货殖家”。由于这些“货殖家”占三行之势，揽百业之广，经营复杂，吞吐浩繁，故所掌各业一般都有“帐房”这样的私家财计组织设置。在代代承袭相传的经营过程中，渐自也有了一套会计核算的专门方法。